

知青篇

垦荒去

黄警徐

1958年初春，我正在广州市第十七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

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中国成立已有好几个年头，国家已从夺取政权过渡到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阶段，全国一片热气腾腾。

郑逸夫老师曾在第十七中学任教，虽未做过我的任课老师，但我爱好文学，也曾在报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文章，他是个只比我大几岁，但已在部队锻炼过几年，出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经其他老师引荐相识后，对他的文采钦佩得五体投地，不时向他请教。以至他调去别的学校，我还是师从甚紧，有空就往他家跑。

这天，我又到他在豪贤路的家。他与同住的兄长、任职广东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的郑潜云正在商讨问题，见我到来，逸夫老师对我说：省委陶铸书记已多次动员干部下放基层，我们搞文学的，尤其要珍惜这个机会，按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说已写信给陶书记，坚决响应党的号召，要求下放到阳江闸坡渔村。

我说，报纸上正在大张旗鼓动员青年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街上，共青团市委与市青联合办的青年上山下乡报名处，人头涌涌，热闹非凡。老师要下去，书是无心读下去了，我也要下乡，到火热的生产第一线去！

在旁的郑潜云老师说：有句老话说，水到渠成。挖渠是很艰

苦的事，但只有艰苦开挖，水到就成渠了。搞文学创作当如是。

当我把决心付诸行动时，一盆冷水泼下来：不接受在校学生报名！这可点着我的死穴了。一年多前，初中毕业，恰逢招考空军飞行员，全校几百同学报名，只有我与另一同学张活球，是过了三次体检关的“备选生”，已到家访阶段。结果，两人都圆不了蓝天梦。我想，一定是父母从中作梗。这次如周折太多，被父母察觉，可能又会壮志难酬！

可是我已17岁了，自己的命运应该自己做主。与几个好友商议后，决定绕过父母这一关。于是，请了擅长书画的张树辉同学，以我父亲的口气，用毛笔字写了一封“家庭生活困难，要求退学到农村去”的申请报告，偷盖上父亲的私章，送给学校领导。不料学校很快批准了“我爸”的申请，开具了退学证明。校长叶文秋特意找我谈话，鼓励我到农村后，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到青年下乡报名处拿了报名表，我在表的“愿意到什么地方”的三个志愿上全填：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当时有四个地方供下乡青年选择：粤北山区的始兴县，距离广州约100公里的中山县，广州近郊的九佛乡，以及千里迢迢、隔海相望的海南岛。报名后，在北京路青年文化宫分组学习，我选择了海南。此前对海南一无所知的我，又打听到海南有琼山、屯昌、保亭、崖县四处安置广州青年。我又选择了最远的，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崖县。“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新中国的青年，壮志满怀来闯关了！

与到其他几个地方不同，既不是下农场，又不是到农村插队，到海南的统称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在短暂而难挨的日子后，三月初，我终于得到了被批准参加垦荒队的通知书，以及共青团市委赠送的一顶竹雨帽，上面印着令人充满自豪感的“广州青年志

愿垦荒队”几个大字。

当我带着这两件新的“身份证明”回家，父母亲都惊愕了。怎么一个正在读书的儿子，瞬间就成了要下乡的青年了呢？父亲在他五子二女的大家庭里一向寡言少语，家务重，母亲未能外出参加工作。曾任广州中央医院（现广东省人民医院前身）会计主任的父亲，当时已调至广东制药厂工作，每月领着60多元的工资，一家九口人的担子，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实在是太沉重。对我不愿上学，他别无话说。但为什么不叫爸找份工作呢？以他的关系，当时找份工还不太难。再不然，要下乡到近郊九佛也好嘛，偏偏就要去海南那么远。情知不可挽回，母亲只能泪眼汪汪的为即将远行的儿子打点行装。其实有什么行装？两个袋子，一个装了衣服和被子，一个装了书籍——中学的课本和一些文艺书籍而已。

我的好友又别是一番情致。离情别绪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推崇壮举，相许未来。其时正好由张树辉（云淡）、张树邦兄弟，罗航烈、李筱孙、梁守中（雪逸）、林鉴流（云岚）、胡敬恩、吴九如等爱好书画的好友，合作了一幅题为《春色》的国画习作，由我送《广州青年报》发表，得了3元稿费。这在当时，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可是一笔大收入！大家用这些钱到小食店里吃了一顿云吞面，算是为我钱行。那时的云吞面，才一角钱一碗。还有余钱，买了一本大笔记本，大家签上名，给我留念。

3月14日是我们启程的日子。我所在的高二乙班于12日举行了欢送会。课室里桌椅围成一个圆圈，黑板上大书着欢送的粉笔字。这天不但本班的，还有其他班初中时的同学，平时的玩伴等都来了，把整个课室挤得水泄不通。会上，老师、同学说了不少祝福勉励的话。我把一本活页纪念册拆开，分给同学们留言，很快收集到几十份肺腑之言。这册子，我至今还珍藏着。

3月14日，凌晨三四点钟，黄沙码头就已熙熙攘攘，满是将赴

海南岛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及送行的亲友。我坚决不要父母送行，我怕见他们流泪！约了两三个好友，带着简单的行李，早早地来到码头，又匆匆地走上船去。

船是专门行驶沿海的广州海运局“四门”之一的“歧门”轮，能装几百名旅客，算是当年的巨轮了。而这次装载的大多是垦荒队员，我们去崖县的有40多人，分住紧邻的几个舱，但一个共同的目标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很快熟稔起来。

凌晨6时左右，一声鸣笛，“歧门”轮徐徐离开黄沙码头，驶过白鹅潭，在晨曦中，沿着滔滔珠江，满载着这群广州青年的青春之躯和各种绚丽的梦想，向海南岛驶去。

别了，广州！别了，亲友！我们现在奋然前行，当再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将给你鲜花与微笑！

50年代的知青生活片段

谢洁晶

1958年，我于广州市第十一中学（原南海中学）高中毕业后，工作还没着落。我的老师知道后，介绍我去粤北山区插队务农。这也是一条出路，当时我是抱着既然别人能去，我也不怕去的天真的想法。

同行的十几位男女知青一路上谈笑风生。我们乘火车，深夜到达韶关。就在候车室守着行李休息。春夜寒冷！次早，我们乘汽车往始兴县城。中午，在县招待所，县委领导接见了我们，说了一番欢迎和鼓励的话。第三天早上，我们乘汽车到达石人嶂矿山。稍作休息后，就开始步行前往插队所在地——司前镇红星高级农业社。需赶70华里山路呢！

我们翻山越岭，涉水过溪河，拨开过人高的茅草，走在曲折的羊肠山路上，有时提心吊胆走过湿滑的独木桥……天气阴冷、细雨纷纷。路滑泥泞，不时会有人滑跌，满屁股泥浆！走在危险路段时，大家手拉手互相扶持，过后便是阵阵大笑！路途十分艰辛，但正值春花盛开时，走在满山桃李中如入仙境。念上几句古诗词，大家也乐在其中。

傍晚时分，听见同行的一位知青指着远处的泥砖农舍高喊，“到了，到了，到家啦！”大家兴奋地加快了脚步，向不远处那座升起了炊烟的农舍走去。

村干部及留队的知青们热情地迎接我们。我的知青生活就此

开始。

为了让知青们有个适应过程，组织上安排我们初期是集中居住。10多名女知青轮值当炊事员。各人按份额交付伙食费。粮油由农业社定量供给。经常吃的是青菜或咸菜。但我觉得累了饿了有顿吃的就行了。当时，也有个别知青受不了劳累和饥饿，借故留在宿舍里睡懒觉，后来请病假回城了。

大跃进时期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知青们被分派到各生产队去，我和另一位女知青同到江草片游李屋村。

生产队安排我俩人住李屋村一间空置的农舍。里面空荡荡，布满灰尘。队长走后，两个前来帮忙打扫的女社员悄悄告诉我们，这屋先前住过一位产妇，因难产去世，之后就一直空置着。时值黄昏，屋里昏暗，联想到死人的事，顿生恐怖感，不敢在此住。其中一位女社员便热情邀请我俩到她家去。这晚，我们三人挤在她家大床上过夜。虽已很累，却难以入睡，身上多处被臭虫咬起了疙瘩，却不敢声张。

次日，队长另行安排我俩住处，并未责怪。我们住到一对中年夫妇的阁楼去，他俩还未有孩子，老实安分，不多言语。阁楼里空空的，临时安放了两张板床，没有桌椅，我们写字时，以床板作台，楼角里摆放着一个绿色的陶罐。社员说，那是户主先人的骨头罐，又称金罐。每当我上阁楼，一眼就看见那绿罐，心里总不免扑扑跳。但别无选择，不能让人见笑，只好自己坦然面对，接受考验。几个月后，同住的女知青回广州探亲，再也没回来，就只有我一人独居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农村公社化，我们成为第一批公社社员，每人每月领取3元生活费，实行大饭堂制，集中开伙。各户必须把粮食全交队上支配。社员下活后，到饭堂每人可领取一碗杂粮粥。若请病假不出勤，就只能领到半碗稀粥了。当时生病的大都是营养不良，吃不饱所

致，一旦减食，病更重，更难受。很多人虽觉浑身乏力，头昏脑涨，但不会轻易请假！我年轻，单身，还能挺得住。收工后，呼啦啦就把那一碗粥喝下肚，感觉就像还没吃一样。回到住处，伸开手脚仰躺在床板上，直到开工号响。虽然又饿又累，但自己是共青团员，要克服困难，带领社员出工去，要努力完成生产任务以改善生活。在干活过程中，有说有笑，以苦为乐，与社员共甘苦。

几个月后，队长让我当不脱产的义务出纳员，并让我搬到另一个农户家去住。户主也是一对未有孩子的中年夫妇，开朗健谈。我就独自住在他家阁楼。没有柜，门上也没锁。就只能把队里的钱放在被袋里。

刚下乡，我就下决心练力气。主动为户主挑水。干活时，不怕苦不怕脏。挑起一担上百斤的湿谷也行走如常。

大跃进年代，大家日夜苦干。晚上，在田间撑上一盏汽灯（大光灯）或各自带上小油灯，弯腰曲背地插秧苗、割禾、修水渠……一直干到凌晨三点才收工。回到住处，洗擦一下就睡了。天还未亮，出早工的号声又响起。

夏收的一个傍晚，我与同队的女知青吃过晚饭就带上小油灯、方板凳及农具到田间，想早点动手，多干点活。正埋头割禾，忽听见社员惊呼，大风雨快到啦！快走。我抬头望见乌云翻动，天空一下子变黑，社员们有经验，快速跑回家去了。我们尚未回过神来，雷雨大作。一阵狂风把凳上的油灯吹翻了。电闪雷鸣中可见远处山村摇曳。我俩滑跌在田野里，摸不着路。正不知所措时，见有灯光由远而近。有人提着风雨灯及蓑衣向我们走来，边走边呼叫着我俩名字。我们不禁狂喜。来接我们的是队里社员，他关爱地把我俩送回了住处。

粮食短缺，队长发动社员采摘可吃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经漂洗后由饭堂加工、分配给社员充饥。最困难的几天，我们只有

无米屑的谷糠充饥。拉出的粪便像猪粪。我还是没悔怨，与社员同努力，实干、苦干，争取好收成。

我同时兼任生产队统计员，每天要抽空向大队部电话汇报生产进度。我一向如实汇报数字。后来，发觉对方以不满的口吻追问，提示我要报大数才能争上游。数字提不上，就是下游，就会当乌龟。拖累了大队，要挨批斗受罚！我还是实话实说。心想，为什么务实者挨批，务虚者受表扬呢？当时，上级要求大家写大字报。我在一张大字报上写出心里话，认为虚报成绩是做假，与党、团教导相违背。这张贴在山村墙头上的大字报，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当时的我还是一肚疑惑！

公社经常在晚上召开社员大会，开展反瞒产运动，批斗那些“瞒产”的大、小队干部。其实，他们很可能只是实话实说、不敢说假话的老实人。参加这种批斗大会，心里真不是滋味。中央领导何时才能了解到基层的实况，问题何时可解决？

作为知青，除日夜在田间苦战外，还与生产队干部一起参加各种大小会议。开会也苦战，当接到开会通知，我们就得摸黑赶山路到大队部或公社去。大小领导轮流上台作报告，下任务……台下的人，有的伸长耳朵听，唯恐有错漏，有的人则低头打瞌睡（包括领导），一个讲完了，走下台去，不久也打瞌睡了。主持人把另一个唤醒，让他上台，又滔滔不绝作报告。好不容易挨到散会，大家困得很，总算松口气。我们路远，还得连夜赶回生产队。一行人在月色或星光下又或在手电光照下急匆匆地穿山越岭。走着走着，看看身后，哎，少了两个。哎，又少了三五个。最后，就剩下住得最远的人了。大家总会禁不住哈哈大笑！回到住处躺下就睡。不多久，出工号又响了，该起床干活去啦！

山区土地贫瘠，上级下令要深翻改土，把灰土骨都翻上来了，农作物更长不好了，瞎指挥的恶果处处可见！

冬春气候寒冷，常有霜冻。早上，从窗户往外看，可见屋顶、田野上，白茫茫的，多冷的天气也得到田间干活去。南方是水田，必须光着脚出门，赤脚踩在白霜路面走，冻得发痛。春耕耙秧田、播种，双脚埋在烂泥浆里，很快就麻木了。实在难受时，大家走上田坎烧上一小堆火烤一下又再下田去。要赶早完成生产任务呀！

在社员热忱教导下，我学到了书本上没学到的许多知识，能跟农民一样干各种农活。我心想，社员能做到的，我也能克服困难做到。我要赤脚能耕田，穿上高跟鞋能轻盈地跳舞。

1959年4月的一天，始兴县委召集插队知青到县政府开会，内容未公布。开会前，大家有点莫名其妙。由于长期分散在各生产队干活，难得一聚，这次见面，话可多啦，挺热闹的。

傍晚，县委领导接见了我们，赞许了我们，还宣布了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好消息。领导说，有些知青经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回城了，留在这里的你们，是经受了磨炼的好青年。现在，公社有许多工作要展开，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去做。例如，拖拉机将买回来了，需要拖拉机手去开，医疗、教育、水利工程……都需要有文化的人。你们可以重新选择工作。若想升学，也可带户口回广州报考。哗！特大喜讯呀！当时，插队务农是响应党团号召，是自觉自愿，自带费用上山下乡的。没想到还有机会另行抉择前途。这晚，大家异常兴奋，相互交谈，考虑再三，作出决定。

我觉得自己学识很浅，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决定回广州参加高考，学习专业知识，以便更好地为祖国建设出力。

四月下旬，决定升学的七位知青，带上行李（书、被等重物已办托运），告别乡亲，离开山村返回广州。我们几步一回头，依依惜别。

我们涉水翻山赶到县城，带上县委出具的证明继续上路。回忆初来情景，不胜感慨。到达广州那天正好是“五一”节。

知青生活结束了，它永远留在我们记忆深处。我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服从分配到江门化工行业工作。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写后期知青生活的多，而有关50年代自愿自费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则未见写及。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简单地写出此文，作为史料提供参考，这一切，现代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上山下乡，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梁想熙

1958年，我参加了由共青团广州市委举办的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队伍，现在已是60多岁的老头了。

回想46年前的亲历，许多已记不清了，但当时团市委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仍然在脑海里出现。1958年初，团市委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当时17岁，因家里穷还在惠福路练伯小学（私立）五年级读书，就积极报名参加了。不久参加了由团市委举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习班”。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学习班的主要内容是：认识上山下乡的意义；为什么要参加上山下乡；听取中山县团委同志介绍中山县的情况。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我正式成为广州市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员。1958年春节过后不久，在团市委组织安排下，广州市首批150多名知识青年坐上“花尾渡”船，经过一夜的航行便到达目的地——中山县白蕉乡，我被分配在灯笼社东五围务农，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情景是：人民生活贫穷，住茅草房（因为靠近大海，地基不牢，茅草房可防风，防水浸）。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我还是和大家一样，访贫问苦，与当地农民结识交朋友，了解当地情况，在生活上他们也非常关心我们，给我们解决生活上所需物品，在劳动上手把手教我们，使我们在短短数月里就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农活也学了一些。他们辛勤劳动和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因而我暗下决心向他们学习，努力工作，由于我工

作积极、肯学，获得他们对我的好评。但这里的环境确实很艰苦，不像在广州参加学习班时中山县团委同志所介绍那样好，因而有部分知青怕艰苦，经不起考验，思想上产生了波动，纷纷要求返回广州。在这种情况下，中山县团委和乡政府领导共同为我们做思想工作。宣传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希望来自广州的知识青年能安下心来，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努力。随后对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整顿，并进行上、中、下游评选，我由于工作积极，肯学，群众关系好，被大家评为上游（150多人中被评为上游的只有17名，我是其中一个）。后来，乡政府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分别安排我们参加乡社办的商业和工业部门工作，我被安排在白蕉乡铁厂、后转中山县赤坎铁厂工作。

我下乡务农时间虽然不长，但从中体会到农民是朴实的，他们那种不怕艰辛拼命劳动的精神是鼓舞我在后来几十年努力工作的动力，使我深深体会到不管在农村或在其他部门工作，一定要脚踏实地做到干一行爱一行，要克服工作中的困难，与此同时还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做到团结同志，努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任务。

几十年过去了，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小娃娃成为一个国家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1年6月办理了退休安度晚年。

2004年10月18日

闪光的青春

卓子聪

前 言

我是广州市第二十七中学的学生，1961年临近中学毕业时，自己也为今后的出路想了很多很多。当年，国家面临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困难。加上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工业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都非常艰苦，生活必需品定量供应，城市居民每月供给27斤至45斤粮食，农村农民供给38斤至45斤粮食，其他蛋、肉、鱼、油、糖、煤、柴、布、烟等等都要用定量的票证供应。当年由于粮食配给定量少，番薯成了最好的代用粮。我就在这个年代中学毕业。

毕业前学校召开了动员大会，介绍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要求每一个毕业生做好思想准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每个班推选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表示一定服从祖国的需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我参加了学校的动员大会后，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静，想了很多很多，经过一段时间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服从祖国的需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做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把青春贡献给农业。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家人说了，也得到父母和亲友的同意和支持，当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心情很激动。

毕 业

临近毕业考试时，每一位同学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在学校的草地上，运动场上，山地上，树林中的羊肠小道上，在清静的环境里静静地看书、复习各门功课，争取考出好成绩。平时喜欢打球、跑步、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等各种运动的同学也都静下来复习功课。

当年我住在学校附近的百灵路兴隆东街，学校的东面就是越秀山，越秀山下南面是中山纪念堂，这里的风景非常优美又很清静。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见有同学在复习功课，我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来到这里复习功课，一直到中午才回家，吃完午饭就午睡。一个上午的复习后精神也够疲劳的了，午睡后精神特别好，那年代是没有电视机的，坐在凳上听听收音机，关心国家大事，也听听优美的音乐和歌曲，这时的心情也特别好。晚上人们聚集在大街小巷，有看报纸的，有听收音机的，也有在一起谈工作生产的，还有在一起研究技术的。我为迎接毕业考试，又静静地复习功课，一直到很晚才进房入睡。

经过很多天的复习，终于迎来毕业考试的那天。清早，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清凉的晨风轻轻吹来，精神特别好，吃完早餐，带上必需的文具就向学校走去，同学们很早就回到学校了。不一会儿，上课铃响了，这时课室里很静，老师开始发考试卷，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做试卷。毕业考试后，每个同学都在议论着各自的答卷。这时答对试题的非常高兴，又跳又高呼，而答错试题的就没精打采，唉声叹气。

几天过后，所有毕业的考生的成绩都张贴出来了，考生各自争相看着自己的成绩，也在对比别的同学的考试成绩，这时候从脸部的表情就可以知道各位同学的考试得分情况。

又过了一些日子，升学考试也考完了，这时我们都在静静地等候着最后的升学考试的结果，这是决定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位毕业生的去向如何就决定于那张“录取通知书”了。

形 势

毕业考试后，毕业生的成绩也知道了。同学们开始议论着国际形势和国内的形势，谈论目前社会的就业情况，有机会升学的就想升学就读，无机会升学的也争取明年再考或就业。

这时，在毕业生中，我看见一些考得成绩优秀的同学在高呼“万岁”，有升学机会了，他们兴高采烈地一个劲地跳。而我们这些考试成绩不够理想的则是心情一落千丈。只好自己去努力想办法另谋前途、出路了。在出路问题上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中学时有两位同学和自己很要好，我们也常在一起谈起考试的成绩和今后的前途出路问题。有一位叫李志文的同学，这次考试的成绩优秀，他后来中专毕业后在广州安排了工作。还有一位同学叫刘德声，他和我考试的成绩差不多，选择了靠亲友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好友们都有了自己的工作。

这时我的出路还无进展，不知如何是好，日子一天天过去，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在一次回校的日子，校长和班主任召集了全校毕业生开会，校长为毕业生讲了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总体是“东风压倒西风”，但在国内，苏联撤走了所有的专家，使得国内的全部援建项目都停止了，国民经济受到了极大影响，就业面临很大困难，没有门路是很难进工厂工作的。农业上全国经受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有的人因营养不良而得“水肿”病，到医院看这类“水肿”病，医生除开一些药外还写一张买糖的证明给你，凭这张证明就可以买到份外供应的食糖。校